

解構上海「動態清零」 －生命政治學的批判

Deconstructing the Dynamic Zero COVID Policy in Shanghai—
A Critique of Biopolitics

宋國誠 (Sung, Kuo-Chen)

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

壹、前言

「清零政策」(zero -COVID policy)，又稱「社會面清零」或「社會面動態清零」，是指發現傳染病確診個案，即在醫學收治同時進行流行病學調查、隔離密切接觸人員、控制病毒影響範圍，以減少傳播和確診人數的一種防疫政策。這種防疫策略於今(2022)年4月至6月在中國大陸(下稱大陸)上海市實施，並達到空前澈底和極端形式，不僅重創經濟與社會心理，也造成難以估計的「次生災難」與人道侵害。

雖然「清零」是防疫政策選項之一，但在大陸實踐，表現世界僅有的「社會主義生命政治」特徵，這是一種出自對大陸居民生命價值的虛無化與空洞化，以社會主義教條對人的生命權力進行極端操縱與強制管控。過程中，「居民」(citizens)做為具體的城市住民，不具有主體性、獨立性與權利地位；「黨國」做為一種主權專政機器，對居民生命存續具有專斷性與任意性，這種「黨國/居民」之間從「生命政治(給生)」向「死亡政治(給死)」之轉化，在上海市呈現完整個案，並且難以用現代主流政治學解釋。

本文以福科(Michel Foucault)、阿甘本(Giorgio Agamben)之「生命政

治學」及相關理論交叉演繹，解構上海清零的「霸凌專政」，揭示主權暴力下之人道悲劇。

貳、大陸「疫情－後真相」

大陸部分省(市區)因飽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尤其是上海市史無前例啟動封控模式，引發民怨激烈沸騰及國際關注。大陸實施「動態清零」政策的運作邏輯，即是集中資源辦大事思維，並秉持「犧牲小我、完成大我」、「短期利益服從長期利益」及「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」原則。大陸鑑於西方「躺平」政策所產生諸多後遺症，仍堅持實施「動態清零」政策，避免短期內感染率和死亡率上升，重創經濟社會發展，危及小康社會及扶貧攻堅成果。

大陸在疫情期間將感染病例保持在低水平，主要透過嚴格封鎖、大規模核酸檢測及疫苗接種；調動最基本藥物和食品供應，始得以在武漢市、西安市和上海市等城市實施極端限制措施。然而，「動態清零」政策措施雖屢遭質疑，會影響經濟增長、導致就業率下降、供應鏈中斷及阻卻外資吸引，但大陸高層仍逆反輿論，堅持「動態清零不猶豫、不動搖」。究竟原因為何？頗值深究。

首先，減少對弱勢群體生命危害。儘管 Omicron 造成致死性率比 Delta 低，但 Omicron 流行期間造成死亡總數，高於 Delta 流行同期死亡數。大陸 60 歲以上人口達 2.67 億人，少年及兒童人口總數超過 2.5 億人。上海市是全大陸最現代化城市，其老齡化程度較其他城市高，截至 2020 年底，60 歲以上戶籍老年人口達 533.49 萬人。因此，大陸高層考量 Omicron 超強傳播性、龐大人口基數，及相對薄弱的醫療資源，這對接種率較低的大陸社會廣大弱勢群體來說，恐形成重大威脅。

大陸認為實施「動態清零」政策，利於降低死亡人數及促進經濟增長。

今年5月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仍堅決實施「清零政策」，官媒堅稱清零相較「與病毒共存」策略，更能保障公眾生命權和健康權；同時還能保住經濟增長率。一份復旦大學等機構研究顯示，大陸若放棄清零且不採取加強疫苗接種，及治療支持等適當保障措施，將導致約一百五十萬人死亡；若採取保障措施，則可以大大減少死亡人數。此措施被視為有保護兒童及老年人，因疫苗接種率較低可能造成的危害。

其次，體現大陸國家治理體系相較於西方制度之優越性，加強黨國對社會統治及控制。大陸在上海市疫情防控付出慘重代價。其目的，不僅意在維護上海市做為全球金融中心及世界貿易港地位；同時，避免「上海保衛戰」失控，進而漫延擴大成為「全國保衛戰」。一旦上海市疫情防控放棄「動態清零」政策，疫情極有可能失控而重蹈香港覆轍。大陸宣稱武漢市及湖北省是「武漢保衛戰」、「湖北保衛戰」，「上海保衛戰」攸關中共堅持的道路、理論、制度及文化之「四大自信」，涉及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及有效治理能力，以展現「中國模式」、「中國之治」其制度及治理優勢，這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國家形象息息相關。

大陸黨國體制與「新型舉國體制」結合，形成一套權力集中化體制，以奠立在一套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」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。大陸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，為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」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。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，必須堅持「黨政軍民學、東西南北中」，黨是領導一切，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，健全總攬全域、協調各方的黨領導制度體系，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、各方面、各環節。而黨國體制及「新型舉國體制」結合，在政策過程中從決策、規劃到執行，採取集中動員一切人物力資源方式防控治理新冠肺炎疫情。

再者，實施「動態清零」政策被視為對長期經濟有利。大陸政府及媒體批判西方「躺平」政策後遺症嚴重，西方國家反對「動態清零」政策，宣布採取與病毒共存方式防控疫情。惟此種「躺平」政策並未帶來西方國

家經濟社會復甦，反觀大陸堅持「動態清零」政策，不僅短期內率先遏制疫情漫延，復工復產促進經濟增長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。例如 2021 年，大陸 GDP 比上年增長 8.1%，2 年平均增長 5.1%，經濟增速位居全球主要經濟體之前茅。

大陸在此認知下，尤其是「習核心」更是堅持「動態清零」政策，儘管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多次呼籲要「穩經濟」、「穩就業」，中共在 20 大召開前隱約呈現出兩條路線分歧。伴隨上海市疫情防控趨緩，今年 5 月 29 日，上海市公布《上海市加快經濟恢復和重振行動方案》，可分為「四大板塊」：第一板塊，全力助企紓困。包括緩繳五險一金和稅款、擴大房屋租金減免範圍、多管道為企業減費讓利、加大退稅減稅力度、發放援企穩崗補貼等方面。第二板塊，復工復產復市。取消企業復工復產白名單制、擴大企業防疫和消殺補貼範圍、建立長三角產業鏈供應鏈互保機制、暢通國際物流運輸通道等政策措施，穩步提高企業達產率。第三板塊，穩定三大需求。圍繞穩外資穩外貿、促進消費加快恢復、發揮投資關鍵性作用等方面。第四板塊，強化支撐保障。圍繞資金、土地、人才、營商環境等方面，提出一批支撐保障性的政策措施。

最後，證明「新型舉國體制」下運動式治理，體現大陸執政能力。所謂「動態清零」政策，並非純粹追求絕對「零感染」，是強調不出現疫情的規模性反彈。黨國體制融入「新型舉國體制」，堅持「動態清零」總路線，以快速、科學、精準防控舉措阻斷 Omicron 病毒社區傳播鏈條，實現社會面清零。大陸視這種「動態清零」為一種有效運動式治理，並標榜這是一場疫情防控人民總體戰。

大陸也宣稱，天津市以 2 週實現全社會面清零，深圳市從緊急封城到逐步解封，限制時間約十天；吉林省則是抗疫四十多天後，實現社會面清零。大陸認為在此既有基礎上堅持「動態清零」，也依據先前成功經驗在首善之區上海市實施「動態清零」政策，並從大內宣及大外宣策略凝聚社會民眾，宣導黨國體制下的「新型舉國體制」最終會打贏這場防疫攻堅戰。

參、生命政治：淘空城市、淨化人口

面對上海市疫情爆發及病毒對大量生命威脅，政府一旦介入，就面臨法國哲學家福科 (Michel Foucault) 關於「生命權力」(biopower) 管理問題，也就是權力如何管理人口的「生命政治」(biopolitics) 命題，亦即「生命」如何成為權力規訓 (discipline) 的特殊領域，個體生命如何成為政治施控 (manipulate) 的對象等。這種生命管理包括對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觀配置 (人口的解剖政治) 以及對個人身體的微觀控制 (身體的解剖政治)；在福科的脈絡中，「生命政治」具有正向的功能性，是一種國家運用訓練、教化、管理等等方式，培養健康、有用、具有生產力之「公民人口」政治技術。但是在大陸社會主義體制下，對於上海市疫情而言，不是一個增進生命素質的問題，是一個關於 (城市) 空間與 (居民) 身體如何進入黨國防疫策略與權力干預的技術操作問題，也就是把生命置入例外狀態、法律孤島、人道免除的狀態；這就是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 (Roterto Esposito) 在《生物：生命政治與哲學》中指出的，主權政治總是對一般生命玩弄骯髒遊戲：藉由保護生命而摧毀生命。換言之，上海市的封控防疫，具有生命政治與「死亡政治」(thanatopolitics) 的交互辯證，一方面，居民以「自願奴役」成為「屬民」，一方面黨國以「法外主權」進行統治，也就是黨國在管理生命之時走向死亡生命。

「清零」政策首先是把上海市空洞化為「疫區」，一個污染之地、待罪之身；其次再把上海市居民虛無化為「災民」，一個等待救援、接受淨化的無差別群體。於是，在「非必要不離滬」禁令下，上海市不再是高樓大廈、車水馬龍物理空間，居民不再是具備性別、年齡、職業與身分差異個體 (身體)，而是一種虛化的存在物。在此處，人權在所有「病體」上沒有任何意義。於是，一個具有歧視標籤的「城市難民營」就油然而生，一種為隔離病毒而進行人口強制管理的空間策略；在此空間，「城市難民」並不具備國籍和公民身分，只是等待清離的剩餘人口。

這種「中國特色的防疫策略」，使上海市失去其做為現代文明空間優

勢與特性，僅僅變成一個「營」(camp)，一個「全景監視」(panoptic)下巨型監獄；至於「市民」則被假設為病毒可能棲身、散播、惡化的身體(病體)，一個「不潔之物」；在疫情爆發之際，法律就已預先對上海居民作「有毒推定」，使上海市民處於「有毒的先驗狀態」，失去做為公民而享有人權保護的資格，這就來到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(Giorgio Agamben)所說的「牲人」(Homo sacer)概念，一個被詛咒的犧牲者，一種被挖空一切、赤條一身的「裸命」(bare life)，一種被主權剝離身體權利並處於例外狀態(the state of exception)的賤民，一種因為染疫而被視為純粹的生物體，一種「去主體化」(desubjectification)的存在物。阿甘本在《牲人》(Homo Sacer: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)，《奧斯威辛的殘餘者》(Remnants of Auschwitz)以及《沒有目的的手段》(Means Without End: Notes on Politics)等著作中，一再闡明適用於上海市粗暴防疫的觀念：統治的邏輯就是捕獲生命(核酸陽性者)，就是隔離赤裸的生命(方艙難民)，把它做為一種例外加以排除(次生災難受害者)。簡單地說，病毒解除了公民身分，「清零」則清除了人權。

肆、上海：「全景監獄」與黨國權力實驗場

今日的上海市，就像一個「全景監獄」(panopticon)，此種特殊監獄是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(Jeremy Bentham)所設計，一種由圓形大廳組成環場建築，環場中央設有直立的監視塔，塔內的警衛可以監視所有的囚犯，但囚犯看不見警衛。中央監視塔就如同「黨中央」，居民居住的社區樓層就像時刻受到監視的囚室，居民則失去個別性與差異性；布滿街頭攝影機就像一隻隻「權力的眼睛」，一個個「電動祕密警察」，緊盯著不服防疫命令的居民。在全景監獄中，囚犯沒有姓名，只有「編號」，每個編號記錄囚犯的紀律表現，做為矯正和懲罰的依據，一如上海市居民必須攜帶可以電子定位和追蹤的「健康碼」，記錄每個人是否服從黨中央的命令。換言之，做為一個擁有2,500萬人口的超級城市，上海市已成為「黨國巨靈」下全景監視的

權力劇場，一個國家權力全面張羅與滲透的展覽館，一個社會控制、肅清異己、懲治不服防疫的實驗區。

上海市的清零與封城，為中共黨國提供極權主義的實驗劇場。在這一劇場中，黨國透過硬隔離、反覆核酸檢測、封鎖街道與社區、方艙隔離、清離染疫者、健康碼、入室消殺等措施，遂行無所不在的監控和管制。此種權力施展，透過市政官員、防疫警察、居民委員會、志工等等，穿透人民的日常生活，逼近人們基本生存底線。換言之，上海市封城提供社會管理與身體控制的「極限測試」，使大陸獲得並更加熟悉大規模城市管制與人口運轉經驗，及測量人民甘願服從程度。

伍、法的「例外狀態」

做為一種社會控制的「清零政策」，是具有權威基礎的「恐怖統治」(governance of fear)，也就是透過物資管理、足不出戶、強制隔離，使人們面臨飢餓邊緣與死亡陰影。漢娜·鄂蘭(Hannah Arendt)在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中反覆闡明，這種具有毀滅性的恐懼感，不但可以降低反抗，也使原本生硬的黨國權力更加潤滑和通透，處於「自我例外」和最高律令的絕對優勢，使「清零」的暴力屬性得以維持和升級。

然而，這種恐怖統治並非來自真實的法律基礎，而是一種「法的例外狀態」，它來自習近平「以自身地位為權力之來源」國家領導者。習近平具有一種阿甘本所說「法的例外狀態」的權威地位，也就是習近平所有的講話、宣示、文稿、指示、規定，都是雖不具備正式法律形式但卻具有最高執行效力的命令；在某些情況下(如疫情時期)，就會轉變成為具有法律的適用性，即被當作法律來執行，進而形成一種「例外的常態化」。這種例外狀態正是極權主義治理的普遍規律。

當習近平宣稱「防疫政策是由黨的性質與宗旨決定的」之時，所謂「黨的性質與宗旨」就產生「法的例外狀態」效果。阿甘本在《例外狀態》(State of Exception)一書闡明「法的懸置」(iustitium)概念，權威者將做為

權力之基礎的法律懸置起來，但保留權威的本性，這個本性就是權威者人身的特殊地位；權威者無須從人民或代議機構得到法律授權，他的權力直接源自於他自身。阿甘本指出，在「法的例外狀態」之下，權威者不受法律約束，權威者本身就是一個「活的懸置法律」。

「法的懸置」意味權威的恆常化、例外化與免疫化，一種「做為合法的無法」(lawlessness as law)，也就是做為常態性運作的非常態性，這是大陸社會主義體制的基本特徵，一個所有公民直接面對領袖意志而自我虛無化的體制，這種體制塑造一種「極權主義的被壓迫傳統」，一種「韭菜命」。法國哲學家本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在《暴力的批判》中指出，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，我們所生活的「例外狀態」不是什麼例外，而是「常態」。

陸、上海市的反諷抵抗

然而「法的懸置」具有辯證轉化特性。一方面，權威者「無法無天」，但正是這種無法無天，被統治者也擁有最大的任性與反抗潛能。這是一種辯證的鬥爭，而當被統治者處於權力弱勢時，直接反抗就會以反諷的形式來表現，也就是犬儒主義的反抗。

例如，一位上海市民在網上留言：「只要不是死於新冠肺炎，怎麼死的都可以！」這種反諷抵抗 (ironic resistance) 是一種將生命政治倒轉為「死亡政治」的具體描寫，將「病毒之死」與「清零之死」做對比後，做出前者「重於泰山」、後者「輕於鴻毛」判斷。實際上，「清零」就是一個「製造裸命」(making bare -life) 的過程，因為如果「清零」是為防止「新冠之死」，而且僅為新冠之死，那麼「其他之死」—所謂「次生性災難」，包括因為沒有核酸證明而被擋在門外的「拒醫之死」、禁閉家中且食物殆盡的「飢餓之死」，足不出戶而精神崩潰的「跳樓之死」，都被生命政治的死亡計算排除在外。

實際上，因封城而死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更多。然而，大陸的統計魔術在於：只要病人不是病毒直接致死，就不計入疫情期間的死亡數字。因為這些「非新冠之死」在政治上是被允許的，在道德上是被寬恕的，在情感上

是冷漠的。「非新冠之死」在清零政策上是一種法律的「例外的死亡」，因而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常態性死亡，根本無須掛念或珍惜，甚至完全可以加以排除 (exclusion)。

這些「非新冠死者」，一如阿甘本筆下的「牲人」(Homo Sacer)，他們死無遺憾，只是「黨國主權」下的犧牲品，是例外，一種微不足道的代價。

柒、我們這是最後一代，謝謝！

一位上海市民在受到防疫警察以「不配合(核酸檢測)會禍害三代」威脅時，冷冷地說道：「我們這是最後一代，謝謝！」

這是一種以「不育」和「絕後」做為「反諷－解構」策略，使「清零暴力」失去其對象性與延續性，進而斷絕暴力施展的蹤跡和路徑。這是一種對暴力的「謝絕」，將「禍害三代」終止於「我們這一代」，這意味大陸年輕世代不惜挑戰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倫理禁忌，一種不對未來抱持任何希望的厭世態度，來表達對黨國抗議。然而，此種抗議，既是一種大哉無望的「斷後」，同時也間接宣告權威者的「斷權」：我的不生，是你權力的斷子絕孫。

捌、上海：我的房子只是「韭菜盒子」

大陸匿名網友留言：「如果花幾百萬、幾千萬買的房子，別人想進來就進來的話，那這個房子就不叫房子，叫韭菜盒子」。

「韭菜」是當今大陸人對自身生命低廉、奴性強韌、任人宰割的自我嘲諷。在暴力清零之下，上海市出現防疫警察破門、翻窗進入民房進行「入室消殺」的盜匪景象，乃至出現任意打開居民家中冰箱噴灑消毒藥水的荒誕行徑，這就是上海市居民將自己的房子稱為「韭菜盒子」，自我嘲諷地將自己比喻為鐮刀之下任憑宰割的韭菜。然而，上海人不知，在「清零」政策之下，上海市已成為 2,500 萬戶的「小型集中營」，裡面住的已不再是韭菜，

而是與病毒合而為一的「陽性病體」，病毒與人體已抹除界線，公民與「牲人」合為一體；為國家健康，做為病體的居民只是應該消除的、不值得存活的剩餘生命。上海人殊不知，防疫政策下居民已成為「上海牲人」。

玖、代價：一種政治免疫的犧牲儀式

大陸名為「深陷咖啡的 Grace」網友在微博上寫道：「上海市不再是文化高地，而是政治據點，上位者如同掃蕩者、侵略者、殖民者一般，政治決策裡，不惜一切代價，我們就是那些所謂的代價，是隨隨便便可以被無視的」。

然而，所謂「代價」，在維護黨國同一性與延續性下，當然可以犧牲。這是上海市民尋求「政治免疫」必須交出人身權利過程，如果必要，暴力也可以介入。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 (Roberto Esposito) 在《免疫》一書中指出，法律具有使用暴力以消除暴力（包括病毒）威脅的必要性，也就是暴力性的免疫防護；在此意義上，上海市清零就是上海居民的「犧牲儀式」，為清除病毒，黨國必須「徵收」(expropriation) 上海市民的人身財產，以交換黨國重新發出之身分認證。

拾、頂層設計：主權者的最高決斷

繼《四月之聲》影片記錄上海市封城實況後，今年 5 月，《中國數字時代》發布網路視頻《五月之聲》，搜集整理 4 月 23 日至 5 月 22 日期間，大陸境內城市疫情封控情況。該片揭示大陸言論審查、權利打壓，記錄民間疾苦、吶喊與抗爭；形式上，該片模仿遭審查下架的《四月之聲》，片中，一首名為「圍」的搖滾歌曲唱道：「圍住了城，圍住了鄉，圍住了繁華與荒涼。圍的盡頭有一把槍……」

影片中，出現多個社區居民集體敲鍋抗議，在同時，傳來一段廣播：「據有關單位通報，境外勢力在鼓動大陸居民敲鍋抗議」；影片中出現所謂「硬隔離」，某小區被強行掛上電網，居民抗議稱小區被當作集中營；上海

市曹家渡一位業主在電話中對街道工作人員抗議：「今天冒一個陽性，明天冒一個陽性，你就是沒完沒了的這樣搞下去，你有本事把蒼蠅蚊子給我清了啊！」影片中一些滯留上海市的貨車司機，已一個多月沒吃沒喝；一個上海市民吐槽防疫的「頂層設計」是「邏輯死循環」：「讓一些智商只有 80 的人來做防疫的頂層設計，搞得好才怪了！」；一個被隔離在方艙醫院的市民說道：我在這裡完全沒有被當人看，沒有被當病人看，這裡邊真的像難民營一樣，像牲口一樣被趕到這個裡邊就完了；一位上海市民聚集抗議「硬隔離」，宣稱：「做事要有法律的，不是領導為所欲為，不是無法無天的時代」；影片中出現一名外國人士衝出隔離大喊：「我要死 (I want to die) ！」影片最後以「中國，早日康復」做為結尾。

該影片正是記錄和證實上海市「例外狀態」，其中「集體敲鍋抗議」、「社區集中營」、「頂層設計」、「方艙難民營」等等，都是針對「制定例外－製造裸命」的「主權者」的抗議。正如德國哲學家施米特 (Carl Schmitt) 所言，「主權者」就是生命政治最高管理者，決斷例外狀態的那個人，也就是在共同體內部隔離出例外狀態，而正是在主權者的至高操作 (頂層設計) 中，也就是在阿甘本所謂「至高禁止」(sovereign ban) 的場域中，生命被排除在它本應受到保護的空間之外。

換言之，所謂頂層設計者正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主權者，頂層設計者正是憑藉無法無天行為，使國家其餘部分成為主權者的輔助和奴僕，從而讓主權權力的效能獲得實現，這就是「社會主義－習近平體制」優越性的表現。

拾壹、上海市的抵抗遺忘

對於疫情結束，大陸不稱「解封」，因而也就不曾存在「封城」，這是催促人們選擇遺忘，選擇抹除「清零」期間所造成的死亡、痛苦和創傷的記憶。然而，稍具常識者皆知，如果沒有封城，那「清零」是在清除什麼？當官方要求人們選擇遺忘之時，更多人選擇抵抗遺忘。

例如大陸一個名為「功不唐捐的孤島」微信帳號，今年 6 月 1 日發布一段影片以黑色為底，配合著歌聲展示歌詞，提醒人們不要去「喝慶功的酒」。一段歌詞寫道：「不要撕掉那一頁日記，不要埋葬公開的秘密，在陽光燦爛的今天，不要諒解黑夜的暴戾」。

大陸媒體人連清川（《讀者文摘》中文版前總編輯），在微信上發文：「六月，難道我們不應該用來追問嗎？如果不曾封城，那麼這兩個月到底是什麼？誰來為這兩個月丟失的時光負責？是誰關閉醫院，讓那些無辜的人死在門口？是誰把人們封在社區裡，任由他們挨餓？是誰丟掉各地支援來的物資，任由他們腐爛在垃圾桶裡？是誰把變質的食物，賣給官方，變成政府物資？是誰封閉道路，讓親人們永隔陰陽？是誰讓那些逃離困居的人，長途跋涉，露宿在火車站？」，「在苦難過後，討論歡樂是件有罪的事。而如果這個苦難本身就是被製造出來的話，那麼忘卻就是一種恥辱」。

這一連串追問，這種遺忘的恥辱感，是推動人們選擇拒絕遺忘而顯示生命政治真正價值之所在，一種對自身例外狀態之生命危急的喚醒與保存。

「上海清零」是當代大陸人無法抹除的痛苦敘事，只有正視自己和他人的痛苦，認清並記住不是「疫情」而是「防疫政策」造就這場結局的「死亡生命學」，才能擺脫「牲人」宿命，進而解構主權者的狂妄與荒誕。